



永明油漆厂名声大

天津的“灯塔涂料”享誉海内外,从我国第一辆红旗轿车、第一架自制飞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长征运载火箭、嫦娥绕月卫星、神舟载人飞船、天宫载人空间站,使用的都是“灯塔涂料”。“灯塔涂料”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其前身天津永明油漆厂是我国民族工业的杰出代表,创办人陈调甫(1888—1961)被称作中国的“油漆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碱的价格猛涨,苏州的吴次伯邀请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的陈调甫和他的老师王小徐用氨法试制纯碱并取得成功。吴次伯北上拜访范旭东商议创办碱厂,两人一拍即合,吴次伯电邀陈调甫和王小徐来津办厂,随后陈调甫专程赴美考察生产技术并购买设备。陈调甫在美国时结识了侯德榜,他1919年回国后即向范旭东推荐了侯德榜。永利碱厂成立后,陈调甫在碱厂先后担任过技师长、视察部长和厂长等职务。除了制碱,陈调甫的兴趣还有油漆,他在1929年创办了永明油漆厂。

陈调甫年轻时就对我国传统的桐油和大漆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搜

集了大量关于桐油和大漆的资料,著有《国宝大漆》一书。他认为桐油和大漆的生产与使用,最早始于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囿于近代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中国传统的桐油与大漆没能跟随现代化脚步,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陈调甫看到西方国家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化学漆后又返销中国,这种工业化的油漆售价昂贵,利润很高。对此,陈调甫痛心疾首,立志要创办中国自己的油漆厂,开创中国的涂料工业。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油漆产业非常发达,美国20年代油漆年产量就达到100多万吨。当时我国的油漆市场主要被外国所垄断,国内只有上海的“振华”与“开林”以及天津的“中国”与“东方”这几家规模稍大的油漆厂,其余一些小厂产量小,质量差,很难与进口油漆相抗衡。陈调甫的永明油漆厂建厂之初,困难重重。他的第一批产品在1929年5月出厂,但这批低档油漆不仅竞争不过进口漆,就连天津本地其他漆厂的国货都没法比,天津的五金店和颜料店都不愿进货。因此,永明油漆厂在最初的两三年里产品滞销,经营十分艰难。陈调甫经过反复思考,认真调研,决定转变思路,生产高档油漆。

他首先从人才入手,从平津地区的高校招聘专业技术人员,为每个技术员配备两名助手,让他们专注于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此外,陈调甫还买来了当时国内市场上能买到的所有外国品牌的油漆,让技术人员对这些进口漆进行化验,逐个分析它们的优缺点。他不仅要求技术人员总结进口漆的优点,还要针对其缺陷提出改进

的方法。在全厂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发现美国的瓦利斯油漆(即酚醛油漆)虽然硬度大,光泽好,但耐水性能差,一经热水烫后会有漆膜变白的缺点。而永明油漆厂研发出来的新款瓦利斯油漆,除了硬度大、光泽好之外,由于加入了国产桐油,其耐水性更高于美国同类瓦利斯油漆。另外,永明的这款新品质量远超洋货,成本还低,一经上市便深受用户欢迎,“永明漆”即成为热销品牌。永明油漆厂从1931年到1936年还先后研发出内外皆可用的“万能漆”和汽车用的“喷漆”。

永明油漆厂的这些新产品成功上市后,陈调甫举办了各种展览会,向商家赠送油漆样品。由于国产油漆物美价廉,永明的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与进口油漆形成了竞争之势。但随着后来天津沦陷,油漆生意日渐萧条,陈调甫于1938年迁居上海,天津永明油漆厂被迫停产。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的工厂、铁路都在复工,许多客户向永明订货,陈调甫在1945年末回到天津,永明油漆厂随之恢复生产。陈调甫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又扩大了研发队伍,着手当时国际上流行的醇酸树脂的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永明的技术团队于1948年成功研制出了树脂涂料,并迅速投入生产。这种新研发的油漆能喷、能刷、能烤,所以也叫“三宝漆”,“三宝漆”很受客户欢迎,成为永明的又一名牌产品。为了扩大生产,陈调甫还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先进的生产设备,比如英国的单滚磨、美国的反应釜等,永明油漆厂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

永明油漆厂能够成为我国油漆行业的翘楚,与陈调甫个人的经营管理有很大关系。陈调甫在永明油漆厂创办之初就题有“做、学、教”的三字厂训,非常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人和技术人员进厂后,他亲自讲解厂训,希望职工们边干边学,参与试验,老人教授新人。在严格的“做、学、教”厂训下,永明油漆厂技师级的技术人员约占职工总人数的50%。从事技术研究工作的,包括技师、技术员和试验工在内,约占职工总人数的20%(见王绍先:《陈调甫与永明油漆厂》)。永明的技术人员待遇都很高,陈调甫还在研发上做了大量投入,对技术人员在图书资料以及试验设备等方面的需求都尽量满足,他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出版的相关书籍,使得永明油漆厂图书室有关本行业的藏书一直是同业中最多的。他还购入了国外的文献胶卷,利用“读书器”供技术人员阅读。永明开办了“技术讨论会”,陈调甫亲自授课,向职工讲解技术方面的难题。厂里设有工人业余补习班,聘请专门的老师授课;工人所用的课本、文具等也由厂里供给;陈调甫还请人给技术人员补习英语、日语等;一些职工在厂外学习的费用永明也会负担。时人对永明的评价是“厂房破,设备新,规模小,名声大”。

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持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当时规定凡是国内能生产的产品,一律停止进口,因此永明油漆厂的油漆销路更广了。1953年1月1日,永明油漆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天津市公私合营永明油漆工业公司”。杨楠

成语小故事——

作壁上观

秦朝末年,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推举楚怀王之孙为楚王,军威大震。已被秦朝灭亡的赵、魏、燕、韩诸国,也伺机复国,与楚王结盟反秦。项梁率军接连取胜,秦二世胡亥急遣大将军章邯统领大军镇压。定陶一战,楚军大败,项梁战死。章邯遂挥师攻赵,围困赵王于巨鹿。赵王向楚王紧急求救。楚王以宋义为主将,项羽为副将,率师援赵。宋义力图避开秦军锋芒,保存实力。楚军开抵安阳,竟一驻四十六天,只待秦赵厮杀两败俱伤,才挥戈出击。这就急煞项羽。他几番催促宋义渡河作战,都被拒绝。宋义甚至说:冲锋陷阵,我不如你;筹谋划策,则你不如我。项羽一怒之下,杀了宋义号令全军,并报告楚王。楚王命项羽为主将。项羽亲率全军渡过漳水,旋即破釜沉舟,每人只发三天干粮,与秦军决一死战。此时,集结在前线的已有十几支各地援赵部队。各路援军见秦军势大,都固守营寨,不敢轻易出战。楚军一到,立即发动猛攻。一场恶战,杀声震天。楚军将士似出山猛虎,以一当十,直杀得秦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各路援军在自己营垒上看到了这一壮观场面。楚军大捷,项羽从此成为各路反秦部队的领袖。

韦编三绝

春秋时的书,主要是以竹子为材料制造的,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竹签,称为竹“简”,用火烘干后在上面写字。竹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这些竹简必须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竹简编连起来的,因此有相当的重量。

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在这以后,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又为了给弟子讲解,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连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几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

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谦虚他说:“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天津地名考——

斜街岔道—寺前庙后

在天津市区,除了老城里周围的道路及其延伸线路之外,您几乎找不到一条正南正北的大道。究其原因,一是地处九河下梢,河道不曲水不流,老城之外的建筑及街道皆沿河修建,因而弯路斜街比比皆是;二是当初九国租界各行其是,各修自家路,休管他人行。因而天津多数街道呈七扭八歪状。等到最后不得不把相邻之路连缀为一时,才发现居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岔道!简直是数不清的斜街岔道。

天津街道通名,普遍采用南北向以“路”、东西向以“道”命名。但这只是规范初衷抑或大体而言,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您看:两条原本平行的路,最后居然交叉成路口;沿着某条街向前走,却走到相反的方向去。因而天津的丁字路口、五岔路口,乃至六岔、七岔路口相当多。例如九十中学、天河医院附近地区,贵州路和西康路两条路竟然交叉,在其交汇处又与常德道、大理道交叉,形成六岔路口;佟楼附近,围堤道与马场道两条道也竟然交叉,在其交汇处附近又与吴家窑大街、平山北道、宾馆路相交,也形成了六岔路口;音乐厅、凯旋门大厦附近地区,南京路分别与浙江路、徐州道、江西路、合肥道、南昌道、马场道、建设路等七条道路相交叉,这里简直成了盘陀路,布下

津门旧事——

天津早期的杂耍场

天津之所以有“曲艺之乡”的美称,不仅因为天津是北方曲艺的发祥地,培养出如万人迷、小蘑菇、高五姑、张寿臣、马三立、骆玉笙、史文秀等一批曲艺名家,还在于天津有爱曲艺、懂曲艺的广大观众群体,大街小巷都可听到老百姓随意哼唱着时调、京韵、单弦、西河,更在于天津有小梨园、大观园、中原游艺场、玉壶春、庆云戏院等数十家著名的杂耍场。所以就有“戏剧大成于北京,杂耍发祥于天津”之说。

天津自明初而富足,人口聚落渐盛。于是,带有天津特殊风格、充分体现“四方杂处”风味的杂耍便应运而生。天津人喜欢把杂耍称为“什样杂耍”,一是因为它的大度包容,广泛容纳了诸如河南的坠子、山东的梨花片、北京的单弦等许多地方的代表作,想家的异乡人在天津的杂耍园子里,不仅能欣赏到五光十色的异地风光,还可以听到亲切的乡音;一是因为它的改制创新,在艺术水平上,天津杂耍来源于地方而高于地方,在河南街头卖唱的坠子绝不如在玉壶春的乔清秀、董桂枝演唱的婉转动听,名教师卢成科独创的梅花调“花派”唱红了大江南北,而未失旧风的郭小霞、刘莲玉反不如“花派”受欢迎。

天津的杂耍场最早是在南市的“燕乐升平”,清代改称“四海升平”,“燕乐三杰”刘宝全、德寿山、万人迷为该园柱。上世纪20年代末,先是刘宝全南下,后是万人迷、德寿山辞世,“燕乐升平”遂趋衰落。1929年冬歌舞楼建立后,天津杂耍场才渐复苏,刘宝全来

津,荣剑尘的单弦、张寿臣的相声随之加盟。当时能与歌舞楼抗衡的仅有东北城角的天晴茶园,天祥市场的小广寒、劝业场的天会轩也曾热闹一时。而1933年歌舞楼改组为小梨园,稍后大观园的问世,将天津杂耍推上鼎盛。

杂耍以天津为发祥地,凡杂耍艺人,不在天津挂号就算不得红艺人。艺人得到天津观众认可,在天津走红,声誉便日益隆盛,到其他地方演出才算角儿,无论观众还是同行才能重视。京韵大鼓是天津杂耍场的主角,刘宝全、林红玉在津长期演出,声名远播全国,小映霞在玉壶春极得顾曲者赞许。1928年夏,驰名上海的鼓姬小黑姑娘来津出演于燕乐,更是轰动津城。

天津观众看杂耍也有自己的特色,往往约三二知己,买一包好茶,大壶一泡,大碗一喝,一边听着玩意儿,大声地叫着好,一边喝着茶、聊着天。杂耍场最令人讨厌的就是肆意的叫嚣声,台上讲话,台下答话,台上唱,台下和,如按旧例演员登台先要有所“交待”,即“垫话”,千篇一律地说:“方才是某某人唱的一段什么,下面让学徒我伺候您一段,唱得好与不好,请诸君多多原谅……”台下便答道:“好嘞,我就爱听这段儿!”园子环境的日趋恶化,导致观众渐少,生意渐淡。进入40年代,随着金万昌、花四宝、戴少甫、高五姑等一批杂耍名家相继辞世,天津的杂耍场逐渐走向衰落。

馆藏珍品——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是战国时燕国的一件青铜器 1966年出土于保定市易县的燕下都遗址老姆台,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现收藏于于河北博物院,是河北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大青铜宫门铺首。

铺首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大门上的装饰物,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要阻挡妖魔鬼怪进门,最主要的方法是在大门上放一怪兽衔着门环,可以防止妖魔鬼怪进门,铺首,是最原始的“门拉手”,可以用来开门、敲门,同时也具有装饰意义。据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可能是燕下都宫殿大门上的构件。

中山王铁足大鼎



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高51.5厘米。是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九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囂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铭文字体修长秀丽,文句典雅优美。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高21.6厘米、长51厘米,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家具构件,是用来安装屏风的底座。错金银是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图案的一种装饰工艺,将金银丝或金银片镶嵌在青铜器上,表现的是猛虎正在吞噬一只小鹿的场景。1977年考古人员在平山县发掘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姬厝墓时出土的。

虎的顶部和臀部各有一个用来安装屏风用的长方形窠。窠两侧是山羊头面,口就是窠口。沿两窠口直线相交,成84度交角,很接近直角了,安上屏后成曲尺形,整个器形构思巧妙而自然。在虎的腹部还有12个字的铭文,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漆板案面已经腐朽没了,只剩下这个青铜的案座,边长47.5厘米。案座的下部有两雌两雄四只侧卧的梅花鹿,四肢蜷曲,承托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条龙的造型都是独首双尾,每两条龙尾交结成一个圆环,凤头从圆环中引颈而出,龙凤纽结缠绕,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上部的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托起了方形案框,也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

彩绘散乐浮雕



彩绘散乐浮雕长136厘米、高82厘米。散乐图表现的是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由15人组成。右边的第一人乃女性,穿男装,头戴黑色幘头,身穿褐色圆领长袍,双手交叉于胸前,手中横握一棒,棒上有双环丝带,似为乐队指挥。右下角2男性头缠布带,好像在进行表演或在队前导引。12名演奏者均为女子,分为前后两排,所持乐器有箜篌、箏、琵琶、拍板、座鼓、笙、方响、革篥、横笛等。图中伎乐人物丰满圆润,表情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